

曾子注译

姜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曾子注译

姜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子注译 / 姜涛著.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209-09210-4

I. ①曾… II. ①姜… III. ①儒家 ②《曾子》
—注释 ③《曾子》—译文 IV. ①B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4842号

曾子注译

姜涛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239mm)

印 张 16.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

ISBN 978-7-209-09210-4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论曾子（代序）

——关于历史上的曾子和曾子的历史评价

董治安

（一）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为后人留下了一节不足四十字的曾子评传：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今天我们了解曾子的生平，仍只能以此作为重要的支点和依据。试略作申释如下：

首先，曾子名“参”，字“子舆”。按曾子名参，见于《论语》《里仁》《先进》《庄子》《寓言》《吕氏春秋》《劝学》等多种先秦古籍；“字子舆”，则始著于此。又按参通骖，并读如森，居古韵侵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林部》“森”字下，有释云：“读若曾参之参。”

其次“南武城人”，按武城为鲁地。考之《左传》，春秋时鲁国有二武城，一在今山东费县西南（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哀公八年），一在今山东嘉祥县以南（参见《左传》襄公十九年）。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称：“南武城在兖州，子游为宰者。”此指前一武城。而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记考证》引孙志祖曰：“《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注云‘曾参南武城人，澹台天明鲁东武城人’，其为两判然。东武城亦单称武城，《左传》《论语》

《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费县；若曾子本邑之南武城，自在今嘉祥县，于曲阜为西南，与费县之在曲阜东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别之。”则是以后一武城为曾子故里了。

兹查明人于慎行所纂万历二十四年刻本（齐鲁书社1984年影印本）《兖州府志》卷七《圣里志中》“曾子”条，有记云：“国朝正统甲子（按为公元1444年）创建曾子庙于嘉祥南武山之阳，旧传有曾子书院在南武山之东，元时碑记可考，故重建焉。”同条目下又道：“成化（按为公元1465年至1487年）初年，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南武山西南，玄寨山之东麓，有渔者陷入一穴中，得悬棺，其前有石碣，镌曾参之墓。’奉诏封树丘陵，筑建飨堂神路，傍松柏缭以周垣，墓在嘉祥始此。”卷二十二《古迹志》“嘉祥县”条也称：“南武城，世传曾子故里也，在县南四十里，以在南武山下，故名。其后改为陈城，今于其下建宗圣公祠。”“耘瓜台，在南武山之阳，相传即曾子耘瓜误断其根处也。”据此，曾子故里及葬地为今嘉祥县以南之武城，其说已见元、明碑刻记载，流传既久，值得重视。

但同上刻本《兖州府志》卷二十二《古迹志》“费县”条下又载：“故武城，在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所谓南武城也……曾子所居。”卷二十三《陵墓志》“费县”条下：“曾皙墓在县西南八十里南城山……《史记》：‘曾子南武城人。’南武城者，汉泰山郡南城即今之费也。县志记曾皙墓在磨山故县之墟，于理为近。”如此，则又定曾子故居并葬地在今费县西南。兹录以备考。

再次，“少孔子四十六岁”。这为了解曾子所处的年代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坐标参数。按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见《史记·孔子世家》），据此相推，曾子当生于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相传曾子高寿，《阙里文献考》有“曾子七十而卒”的话，准此，则其卒年约在公元前435年。此时上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四十多年；下距孟子之生（公元前385年？）也不过四五十年。

复次，“能通孝道”“作《孝经》”。这是汉代及其以后流行甚广的一个传说，然实不足信。《孝经》不惟不是出自曾子之手，而且很可能纂成于刘汉立国以后（详下）。但曾子重孝行，确见载于《论语》《孟子》，这大约正是汉人附会其说的根据。

最后，“死于鲁”。按曾子晚年居武城（见《孟子·离娄下》）；其有疾，鲁大夫孟敬之“问之”（见《论语·泰伯》），当亦在鲁地。又先秦典籍所载曾子所与交往者，几不见鲁之外诸侯、大夫等。凡此，似均与曾子老死于鲁相合。

《论语》成书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之手。今本《论语》二十篇，其中计十三章十七次出现过曾子（或“参”）一名。从条数和字数看，所记多于一般孔门弟子，而少于子路（十三章七十七次）、子贡（十三章五十四次）、颜回（七章二十七次）、子张（十章二十八次）、子夏（八章二十四次）、冉求（八章三十三次）等。

《论语·先进》（以下引《论语》只列篇名）：“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所谓“四科十哲”，自然应该是为孔子所肯定者，或者是为孔门众弟子所推重者，但是，为什么竟未言及曾子其人呢？《先进》篇又有“参也鲁”的话，似为孔子所言。“鲁”是鲁钝不聪敏。虽非有意贬斥，亦绝无推重之意，是不是也反映着孔子的一种态度或评价呢？

看来，孔子在世之时，曾子在诸孔门弟子间，并不特居于“先进”的地位。钱穆先生说：“按曾子于孔门为后进。孔子死，曾子年仅二十七……曾子之在孔门未从凤为弟子所推尊。其后游、夏、子张欲尊有子为师，强曾子，曾子不肯（董按，此见《孟子·滕文公上》）。曾子既为鲁、费君所重，其子又见崇于鲁缪（董按，此事待商）。吴起出曾氏门，显名于楚魏。至孟子推尊曾子，后世因谓其独得孔门一贯之传，实不然也。”（《先秦诸子系年·孔子弟子通考》）是有道理的。事实上，由于年岁为少，入师门较迟，曾子在孔子身边，尚未能如子路、子贡等人那样更多参与活动、讨论问题；而其名声的大大上扬，主要还是在孔子去世以后。

然而，曾子在孔子门下毕竟有其特定的地位。其颇为人称道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对孔子的学说理会比较深切，能够得其要领。《里仁》篇有载记说：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是孔子之基本和核心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见《卫灵公》），而“己所欲施于人”则为忠。忠恕相合，即为仁。孔子不止一次地强调忠恕（即仁）在自己全部学说中的重大意义，视之为串通钱贝的贯。《卫灵公》记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曰：‘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清人阮元于此评道：“此夫子恐子贡但以多学而识学圣人，而不予于行事学圣人也。夫子于曾子则直告之，于子贡则略加问难而出之。”（《研经室集·论语一贯说》）其说甚是。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一贯”者究竟为何？孔门一般弟子、甚至连“十哲”之一的子贡也未能了然，而曾子却能够洞悉孔子微意，一语中的。这是曾子对孔子之道有深刻领悟的一个显著例证。

《论语》表明，曾子像孔子一样推重仁德，并深有体会。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把仁的实现看作是值得全力以赴、生死以求的大事，表现了宏大的抱负和努力实践的决心。又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则是从个人进德修业的角度，说明时刻不忘追求仁德。孔子有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曾子所论，全与孔子相通，同样可以说是得其精要。

孔门儒家认为，仁之本在孝悌（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在《论语》中，多次见到曾子对于孝道的强调和论述。他转述夫子之言道：“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子张》）“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子张》）前者谓父母之丧时，人子必极尽其情；后者在于重复所谓“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学而》）之义。《泰伯》篇另有载记说：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视）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在病中犹以保全身体为虑，是把“免刑全身”视为孝行之重要内容。《孝经·开宗明义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大

戴礼记·曾子大孝》：“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显然都是由此演化而来。

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又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按此条原连上条并释为孔子语，今依清人说订正。）表明他极为重视丧祭之礼、奉亲之仪，以为由此可以彰扬孝道。孔子本已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孝”之说（见《为政》），而曾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所论之蕴义，把孝行（修身）与治民（为政）联系了起来。可以看出，曾子贵孝，并不是仅仅拘于倡言某种单纯道德观念，而是把发扬孝道与转变民风、求得治世结合起来，把孝行纳入了礼治的范畴，体现了以孝治民、为政的政治思想。这是曾子一个重要的思想。孟子以后，包括秦汉之际的许多儒者，津津乐道于曾子之重孝道，并不断为之踵事增华，其主要基础和根据亦在于此。

《论语》所记另一不能忽视的内容，是曾子的“自省”说。他说：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学而》）

所谓“三省吾身”，作为一种自律的要求，不过是对客观实践的及时检讨和反思，并不能视为脱离现实的标志。其实，孔子也曾倡言德化、德教，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曾子所论，实与孔子相通。研究者或笼统指责曾子“内省”说的消极性，夸大其与孔子的不合，似还值得斟酌。

然而，曾子强调“内省”，确乎又有重视个人正心诚意的内容，从而把个人主观修养的重要性提到了更高的地位。曾子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正是说子张只追求言辞仪容之盛美，缺少品德修养的反躬自求，因而难及于仁。又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也是推重对于本职工作的专精不二、诚心不欺。《泰伯》篇还有载记道：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背）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远暴慢”“近信”“远鄙倍”，都是指处事之客观效果；而“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则指修身慎行、言辞不欺等，是对于个人主观修养的要求。这里，作为曾子临终“善言”，把后者视为“君子所贵”之要道，显然是有意的强调，充分表现了曾子对于个人主观修养之异乎寻常的重视。曾子又有言：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同上）应该就是对他通过“内省”所能达到的最高修养境界的热情颂扬了。正是从这里不难看出，曾子之“内省”说，正与孟子之言“性”言“气”和“养心”说相通，前者事实上已为后者开辟了门径。

综观《史记》及《论语》所记，可以得到如下对曾子的基本认识：曾子，鲁人，小孔子四十六岁，为孔子晚年重要弟子之一。他的思想主要承传孔子，而于孔子学说领悟较深，能得其旨要。他重视仁德、提倡孝道，主张“内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的发展。

（二）

为了进一步对曾子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比较全面的说明，我们在力图辨析曾子历史面貌之本真的同时，还有必要联系战国并稍后儒学演化的实际，再作一些补充探讨，还需要把我们的考索向其他古文献作一些延伸。

先秦文献表明，孔子去世之后，在战国时期，曾子的名声有了很大的提高。从《左传》（约成书于战国初年）中，可以多次见到孔门弟子冉求（十一见）、子贡（十一见）、子路（五见）；《国语》（约与《左传》同时）中，也可见到冉求、子夏，而都不见曾子之名。但是，到成书于战国中期或更迟的一些著作中，情况就大有改变。如《孟子》一书，计九章二十二处言及曾子，远远超出孔门其他弟子。又如《庄子》（《骈拇》《胠篋》《在宥》《天地》）、《荀子》（《性恶》《大略》《法行》）、《韩非子》（《守道》《难三》《六反》

《八说》），也都一再提到曾子其人，引述曾子的言论，或以“曾史”（曾参与史鳅）、“曾骞”（曾参与闵子骞）并列，以为某种贤德之士的代表等等。战国后期的政坛人物，在进说国君时，也动辄引用曾子的话（参见《战国策》之《秦策》二、五，《燕策》一）。这就把曾子突出到其他孔门弟子之上，就不是偶然的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一种回答：可能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如上文所引，钱穆先生曾列举到：（一）曾子曾为鲁、费君所重，（二）其子曾申见崇于鲁缪，（三）弟子吴起显名于吴楚。此外，也许还可以征引《韩诗外传》第一章：“曾子仕于莒……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第七章曾子自称：“吾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说苑·杂言》：“曾子从孔子于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似都表明曾子一度为某些诸侯国所重、所用，甚至还取得过很高的职位。

但上述记载并不完全可信。比如钱穆先生所举二、三两项，他自己又有专文订正其谬误。其他如《韩诗外传》《说苑》所记，往往似小说家言，“得尊官”于楚云云就不无夸饰之笔，而所谓齐景公“聘曾子”更与史实不符^①。客观而论，战国之际，诸侯竞以“好贤”“用贤”相标榜，孔门弟子之被任用并不全悖于情理。然而，上述记载中究竟有没有附会之辞？有多少真实历史的投影？今天已难于详考。

从更多史料看，曾子名气的增大，主要还是由于他在孔门传道人的行列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孔子去世以后，儒家逐渐分化（《韩非子·显学》有“儒家分为八”之说）；而作为这种分化的第一步，是孔门弟子纷纷离开鲁国，流散于各地。《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反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按此有误。子路死于孔子在世时），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与这般孔子弟子相比，曾子却守在鲁国旧地，直到老死于鲁。这就使得曾子之传孔学，更易于被视为嫡传，从而带上一种“正宗”的色彩。

① 史载齐景公薨于鲁哀公五年，是年曾子十五岁。而孔子适齐，在鲁昭公二十五年，下距曾子出生尚有十七年。

《孟子·滕文公上》所载的一个故事是耐人寻味的：孔子即没三年之后，“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而“强曾子”。子夏等人所为，或许是出自对老师的追念之情，但何以要“强曾子”——如此看重曾子的表态呢？而且曾子在断然拒绝子夏之后，又态度虔敬地唱出对孔子的赞歌：“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曝）之，皜皜乎不可尚矣！”所显示的，不正是一副孔子之道正宗承传者的姿态么！

还要看到，曾子小孔子四十六岁，是孔门重要弟子中年纪最少者之一。而如上所述，由于曾子的高寿，其一生活活动直可延续到公元前435年左右。同门之中，颜渊与子路早在孔子逝前已经逝世（见《论语》），又据《礼记·檀弓》，子张、子游之死亦在曾子之先。其余如冉伯牛长曾子三十九岁，闵子骞长三十一岁，冉有、仲弓、宰予均长十七岁，子贡长十五岁（此从一般说，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依常理而论，也都难以如享有高寿的曾子在世之久后。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孔子之“后进”弟子，逐渐演为孔门后学的前辈尊长，从而受到推重，就是符合逻辑、十分自然的了。

由于在本学派中所处地位的变化，曾子遂在孔子身后一段时间，成为承传孔学的一位重要和有威望的人物，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曾子及其弟子参与了《论语》一书的最后编纂。

《论语》记载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原出于诸孔门弟子手记，自然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在孔子身后，《论语》一书的出现，既为孔门后学研习儒道、统一思想提供了一部有绝对指导性的经典著作，起到了规范和团结儒家的作用，也有利于在诸子百家争鸣的环境中，捍卫和发展儒家学说。东汉赵岐称《论语》是“五经之馆辖，六艺之喉吟”（《孟子题辞》），并非过誉。因此，《论语》的编纂，不仅对儒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论语》的内容看，当非出自一人一时（参见崔述《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录》卷之四），而其后编纂成书，则为时较迟。早在唐代，柳宗元就指出：“是书（指《论语》）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

号之也。”又“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论语辩》上篇）清人崔述也指出：“鲁《论语》中所记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属皆经谥举……则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后，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同上引《洙泗考信录》）以上所举，足证《论语》编定在曾子死后。柳宗元断言：“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今人杨伯峻先生同意此说而又有补充论证（参见《论语译注·导论》），都是有道理的。但是，《论语》最后之整理、纂定，必然有一个过程。而此一过程的实际开始，又必有年辈居长、孚乎众望者主持其事。在孔子死后半个世纪左右的鲁国，能称此职者，只能是曾子其人。曾子弟子“卒成其书”，恰恰表明其师曾子实际也投入了全过程的部分或大部分工作，并且是主持者的工作；门弟子们不过是续其未竟之绪而已。

曾子门人之知名者，除吴起外，还有乐正子春、公明仪、单离居、子襄、沈犹行等，见于《大戴礼记》《礼记》以及《孟子》诸书所载。在孔子再传弟子中，他们何以较多得留其名？是否与参与纂定《论语》有关？材料所限，难以论定，但值得注意。

第二，曾子为儒学由孔子向子思、孟子的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子思即孔伋，为孔子之孙，约与曾子同时或稍后。孟子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与子思有着间接的师承关系。战国中期以后，子思、孟子及其追随者，形成儒家内部之举足轻重的大学派，《荀子·非十二子》曾指名予以大力抨击，并说：“世俗之沟瞽儒嚅嚅然不知其所非也，遂传而受之。”可见其声势之盛^①。《韩非子·显学》所谓“儒分为八”，也着重提到“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然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子思》二十三篇”，俱已亡佚；“《孟子》十一篇”，也仅存内篇七篇。今天考察由曾子到思孟学派之思想发展、联系的轨迹，只能主要依据于今存之《孟子》内篇。

《孟子·离娄下》（以下引《孟子》只列篇名）先引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与“子思居于卫，有齐寇”，两个相类的故事，接下载孟子之论道：“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这里，把曾子与子思之先后传承，喻为师长与后学、父兄与子弟，极

① 当代研究者或认为《荀子》抨击之“五行”说，不见于今本《孟子》，其所针对，可能为战国后期之孟子后学，有一定道理。但据此断言思孟学派并不存在，却可商酌。

见其“同通”关系之密切；而对曾、思的推崇，意在彰扬，又分明是以后继人自居。可见，曾子对于子思、孟子的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孟子本人，是直言而不讳的。

从《孟子》看，曾子对孟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三端：首先是倡言仁义。孔子有义利之辨，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曾子进一步指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见《公孙丑下》所引）用仁、义与官、爵相抗衡，明确把仁义当作一种立身处世的重要原则。至孟子，则依此原则，建立了一“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的完整理论体系。这种崇尚仁义、贬斥功利的理论，经汉儒、宋儒发挥，在封建社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而其最早确立，却经历了一个由孔子、经曾子、至孟子的发展过程。还可一提的是，孔子言“仁”、言“义”，却极少“仁义”连；“仁义”连用，始于孟子。但从上述引文看，曾子分明已发其端，他同样在孔子到孟子之间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其次是养“自反而缩”之气。《公孙丑上》引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懦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反而缩”，讲的是一种反躬自问正义在握的感觉。曾子认为，能有此种感觉，则能激发“大勇”，虽千万人于面前亦无所畏惧。孟子推重曾子的话，称之为“守约”（得其要领）之论。他主张由立“志”“养气”而至于“不动心”（坚守自己的内心），全与曾子相似、相通。他又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同上）进而申论了“浩然之气”的培养途径及其无往不胜的威力，强调了行为之正义性与人之主观能动作用的绝对重要，论题的蕴义有了更丰富的开拓，其间气象也显得更为阔大了。

再次是推重孝道。孟子如曾子一样大力提倡孝道，重视丧祭之礼。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离娄上》）“尧舜之道，孝弟（悌）而已矣。”（《告子下》）在《滕文公上》中，孟子说：“亲丧，固所自尽也。”旋引曾子之言为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

礼,可谓孝矣。”都可见所受曾子思想直接影响。《孟子》书中还记述了“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和“曾子养曾皙”两个故事(见《尽心下》《离娄上》),有意渲染和宣扬曾子之孝行,以为效法的榜样,也表现孟子及其门人充分肯定曾子孝行观的积极态度。

第三,在曾子影响下,战国秦汉间产生了一批托名于曾子而广为后世所知的儒家论著。其中重要的有《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礼记》(《大学》《中庸》《檀弓》《曾子问》等)、《孝经》。

《大戴礼记》是先秦至西汉儒家论礼资料的汇编,原书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其中十篇(《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托曾子之名,记曾子之言,自宋代起,即被视为《汉书·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之仅存部分;清代乾嘉年间,阮元从《大戴礼记》辑出单行,即以“《曾子》”为题。今按“十篇”屡见“曾子”之名,自非出于曾参本人之手。又有乐正子春(曾子门人)与“门弟子”的问答(见《曾子大孝》),必当见记于曾子再传弟子以后。“十篇”论事往往与《论》《孟》或其他儒家经典相合,而并无简单抄袭古文献弊病;所记曾子之子曾元、曾化,门弟子公明仪、单离居、乐正子春等人与曾子间的问答,虽有增饰成分,却也保留许多可用的史料。总括以上,把此“十篇”定为基本完成于战国后期,是合理的。作者或整理者可能是曾子后学;纂著的根本目的,显然是在于彰扬曾子的学说。

可见,“十篇”对于研究曾子和先秦儒学,仍有其可贵的历史资料价值,在我国伦理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四篇论孝行,“立事”一篇论好学自省、慎思笃行,以及“制言”三篇所记有关重仁贵义、持德守节之类的先贤格言,都有补充《论》《孟》,或阐发儒家经典的意义。“天圆”一篇还保存了古人有关天体变化、律历形成之认识史资料,如其中“天圆地方”之论,就颇可与《吕氏春秋·圜道》等内容相比照。

《礼记》性质与《大戴礼记》相类,也是战国至汉初“七十子后学者”论礼资料的汇编。全书四十九篇,除八篇专释《仪礼》以外,概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关礼或哲学、政治的通论,二是古代礼仪制度的专记,三是孔子及其弟子

等言行的杂录。就其中托曾子之名或称引曾子之言较多的几篇而言,《大学》《中庸》属第一类,而《檀弓》《曾子问》属第三类。

《大学》与《中庸》堪称《礼记》中含义丰厚而论述精到的两篇重要论文。宋儒朱熹以此两篇合《论语》《孟子》而为“四书”,得以广为传诵。朱熹分《大学》为“经”“传”两总分,断言“经”为曾子述孔子之意,而“传”为门人传曾子之言,这就把《大学》判为曾子所作。《中庸》一篇,司马迁以为出自子思(《史记·孔子世家》),这也就事实上肯定了《中庸》内容与曾子思想存在密切联系。清代以来,研究者或怀疑司马迁、朱熹之说,似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两篇的产生均与曾子影响有关则不成问题。像《大学》推重“诚意”“正心”以及“君子必慎其独”的修养方法,并引曾子之语以示强调;像《中庸》对于“至诚之道”的确认,赞扬“舜其大孝也与!”“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称美所谓“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等等,实都相近于孟子,而与曾子相通。据此推测,两篇极可能是出自战国晚期之曾子后学或思孟一派儒者。

《檀弓》(上、下)、《曾子问》都以记丧祭之礼为多,也都较多述及曾子其人。前者侧重记孔门佚闻琐事,在总计百余则中,有关曾子、子思、乐正子春的言行竟达三十则以上;后者更通篇大都托言曾子与孔子的问答。说明此两篇同样可能是出自曾子的追随者或仰慕者之手。《檀弓》篇曾被讥为“道听途说,僵桃而李代”(毛奇龄《檀弓订误》),而《曾子问》中所谓“(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庵党”、孔子闻“子游子徒有庶子祭者”等等,也显然有伪托的痕迹。不过,两文毕竟被收入《礼记》一书,又都是西汉以前的古文献,所记载的礼仪规定、宗法制度以及由此反映的文化思想,都有史料参考价值,弥足珍贵;《檀弓》之简而赅、质而婉的记事风格,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意义。

《孝经》一书,司马迁认为为曾子所作(见前文所引);班固则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汉书·艺文志》)宋王应麟称:“详其文义,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汉书·艺文志考证》)清人姚际恒则肯定:“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古今伪书考》)黄云眉先生更进一步断言:“此书之为汉人伪托,灼然可知”,“其作期必在《戴记》后”。(《古今伪书考补证》)按黄先生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从书

的名称和内容看，《孝经》很可能是西汉儒家迎合当世需要，撮取孔子、曾子言论，而又有所推衍附会后编成。

在《孝经》中，曾子完全被置于孔门主要传道者的地位，而由于《孝经》在汉代得立博士，唐玄宗又亲为作注，五代以后列入“十三经”，广为流行，曾子之名遂也更加传扬。

应该说，《孝经》“广明孝道”的基本思想，与曾子的主张是相符、相通的；《孝经》中所记曾子或孔子的言论，也有不少能从《论语》等先秦文献中找到根据。但是，书中又确乎掺杂着汉人说教的痕迹。如所谓“夫孝，德之本也，孝之所由生也”（《开宗明义章》），“明王以孝治天下”（《孝治》章），“罪莫大于不孝”（《五刑》章）等，就把孝道之要人为地提到了绝对的高度；又如把“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与“庶人之孝”一一分别缕述，借以强调等级的严峻，凡此，都在孔、曾所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挥，更多带有汉王朝力图强化封建政治的烙印。总之，《孝经》的内容既不无同曾子思想存在联系的一面（这同样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曾子的历史影响），同时，又不能如实视为曾子之言的可靠记载，或“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之类；它大体是一部完成于汉人之手的有托古意味的论“孝”之作。

目 录

论曾子（代序）

——关于历史上的曾子和曾子的历史评价（董治安）1

内 篇

曾子立事.....	2
曾子本孝.....	19
曾子立孝.....	22
曾子大孝.....	25
曾子事父母.....	31
曾子制言上.....	35
曾子制言中.....	41
曾子制言下.....	46
曾子疾病.....	49
曾子天圆.....	53

外 篇

《论语》.....	62
《孟子》.....	66
《庄子》.....	72
《荀子》.....	74
《韩非子》.....	78
《晏子春秋》.....	80
《吕氏春秋》.....	83